第 一 章
东夷原始社会的经济
（约 50 万年前～约前 1600 年）

第一节　东夷原始社会生产关系概述

山东最早的原始居民是沂源猿人，属旧石器时代早期。此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中石器时代,山东境内都有远古人类居住。新石器时代的山东居民是东夷人。东夷人经历了北辛文化（约前 5400 年～前 4300 年）、大汶口文化（约前 4300 年～前 2400 年）、龙山文化（约前 2400 年～前 1900 年）、岳石文化（约前 1900 年～前 1600 年）四个文化阶段。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山东原始居民的生产关系经历了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三个阶段。到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东夷人便进入了原始社会瓦解和奴隶社会产生的阶段。

一、原始群

据现已发现的考古资料看，山东最早的原始居民是沂源县骑子鞍山发现的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猿人化石，称“沂源猿人”。沂源猿人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大约同北京猿人相当。

沂源猿人生活的时代，山东大地到处是极其茂密的森林、灌木,草木丛生。各种凶猛的野兽,经常出没森林草丛之中。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种险恶的自然环境之中，沂源猿人为了生存，只有结合成简单的群体。这种群体,我们称之为‘ 原始群 ”。恩格斯指出“: 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①

原始群是以母系血统组成的社会群体。这种社会群体是沂源猿人生存的必要条件。有了原始群，沂源猿人就可以以自己简单打制的各种石器、木棒等为武器，同险恶自然环境进行顽强的斗争。如在沂水县南洼洞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核、石片、砍斫器等,都是经过简单打制的石器。这些石器极为粗糙，反映了当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

在这种条件下,沂源猿人依靠集体,共同劳动,共同生活。那时的劳动收获量很少，人们生活条件极差，经常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在此情况下，根本没有剩余的劳动产品，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私有制等等，私有观念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是原始群阶段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必然结果。那时人们的集体观念受到极端低下的自然条件的严格限制。因为，个人一旦离开了集体，就意味着死亡。死亡逼迫着人们必须过着最低下的原始群的群居生活。

二、母系氏族公社

山东的原始居民在经过了几十万年的原始群阶段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便逐步过渡到氏族公社阶段。氏族公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9 页。

社因血缘关系的不同而分为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族公社。

母系氏族公社是以母系血统为纽带而组成的一个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单位。在母系氏族公社内，生产资料公有，氏族成员男女一律平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因血缘关系是按母系血统计算，妇女在氏族公社享有崇高的地位。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状况决定的。

母系氏族公社又分发展期和全盛期两个时期。

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期，大约从距今二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开始到距今七八千年前的中石器时代为止。经历了 3 万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期的文化较旧石器时代早期进步一些。生产工具的制造有明显的进步和改进。打制石器的数量大增,出现了一些新的工具,如石球、雕刻器、双尖尖状器等。石器的加工次数也多了，有的石器经多次打片和加工制成。这一切都反映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的发展。大约从距今 1 万年左右，一直到距今七八千年新石器时代开始以前，是山东原始居民的中石器时代。这个时期的文化因是以细小的打制石器为主要特征，所以又称“细石器文化”。山东目前发现的细石器文化主要集中在今天的临沂地区，共发现细石器地点 60 余处。已发现的细石器数量和种类都比旧石器时代晚期多得多，石器的制作技术也有显著进步。但是，根据目前出土的细石器资料看，在生产劳动上还看不出男女之间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这个时期,氏族成员之间、氏族内部男女之间都是平等的关系。

母系氏族公社的全盛期，大约从公元前 5400 年的北辛文化开始到公元前 3500 年前的大汶口文化的早期为止。这个时期，社会生产力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是制陶业有了发

展。已发现的这个时期的文化遗址，都有大量陶器出土。陶器的大量出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同时也巩固了东夷人的定居生活。其次，原始农业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农业生产工具有了很大的进步。石质生产工具的制作技术有明显提高，种类和数量也都大大增加。反映这个时期文化的典型遗址是滕县北辛遗址。该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斧、铲、刀)占打制石器总数的 40.1%,成形的磨制农业生产工具(铲、刀、镰、磨盘、磨棒等)占磨制石器的 20.8%。① 第三，纺织业的发展。以上这些生产活动的发明者是妇女，主要的劳动者也是妇女。当时的妇女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氏族公社内部，不仅男女地位平等，而且妇女享有最崇高的威信。反映这个时期母系氏族公社情况的比较典型的遗址是兖州王因遗址。王因遗址共发掘墓葬 800 余座。墓葬分早、中、晚三期,早期属北辛文化，中期和晚期分别属于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和中期偏早时期。王因遗址的墓葬都是土圹竖穴，密集，规模都比较小，往往仅能容下尸体而已。王因墓地流行合葬和二次葬的风俗。随葬品很少,多数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也往往只有二三件,且未见有以石器作为随葬品的。这说明，当时生产力还较低下，石器尚属贵重工具，属氏族公有，死后留给活着的氏族成员继续使用。随葬品的种类、数量，男女基本无差别。而王因晚期墓葬，虽大多数无随葬品，或只有二三件随葬品，但已出现了多达十几件的墓，且农业生产工具多见于男性墓中，而纺轮则为女性墓所专有。这说明，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男女有别、贫富

① 《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 2 期。

不均和私有财产现象。①

三、父系氏族公社

从大汶口文化早期开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男女随葬品的差别，都表明母系氏族公社的全盛期逐渐结束，而父权制已经出现了萌芽。到大汶口文化的中期阶段，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私有制的出现，终于导致了母权制的崩溃和父权制的形成。自此以后，东夷族的氏族社会便从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

所谓父系氏族公社，就是指氏族公社内部的世系完全按父系血缘计算，组成有父系血缘的社会集团，又是一个生产和消费的单位。一个氏族、家族或家庭都是由同一个男性祖先所生的子女及其配偶组成。这时的氏族、家族或家庭实行父权制的统治。财产也是由父系的血缘子女来继承。

东夷族的父氏系族公社大体从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到龙山文化的晚期为止，即大约从公元前 3500 年前后至公元前 1900年前后，经历了 1600 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之内，又分两个时期 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前 3500 年～前 2400 年)属父系氏族公社的发展期 龙山文化时期(前 2400 年～前 1900年）属父系氏族公社瓦解期，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

父系氏族公社的发展期。这个时期，东夷人的社会生产力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农业的发展。考古发掘资料证明，这个时期，大汶口文化的居民，不仅使用石质生产工具，而且还有大量骨质生产工具。石、骨质生产工具种类多，数量大，磨

①《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 1979 年第 1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制精致，还有穿孔。其次，以养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也发展起来。如泰安大汶口墓地有 1/3 的墓随葬猪骨(猪头)。猪在当时已成为私有财产。第三,各种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那时，石器制造业、骨器制造业、制陶业、纺织业等等,都达到了史前手工业的较高水平。第四，氏族内部出现了财产的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现象。经济的发展为男子地位的提高和父权制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当财富开始积累而且希望把财富传给子女的想法导致把世系由女系过渡到男系时，这时便第一次奠定父权的坚固基础。”[①] 男女两性地位的变化，在家庭中便引起了革命。

父系氏族公社的瓦解期。这个时期，东夷人的社会生产力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铜器的出现是龙山文化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东夷族社会生产力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变化。这一变化，成为东夷族迈向文明门槛的最关键一步。其次,农业的发展。石、骨质农业生产工具,形制多样,磨制精致,特别是大型半月形、双穿孔的石刀、石镰大量使用,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三,手工业的发展。陶器制造业出现了‘薄如纸、明如镜、黑如漆’的蛋壳陶,标志着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的制陶技术已达到中华史前制陶业的最高峰。其他手工业,像纺织业、玉制业、酿酒业等,也都有很大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氏族内部及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现象日益加深。考古资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已发掘公布的墓葬资料看，龙山文化时期，一般的墓葬一无所有或仅有几件陶器随葬。而个别大型墓则与此相反，往往随葬大量的陶

①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38 页。

器、精致的石器,以及成组的玉制装饰品,甚至还有特制的斧、锛等玉制礼器。已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和墓葬资料充分说明,东夷族的原始氏族社会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已处于崩溃瓦解之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阶级的产生

自大汶口文化中期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发展,私有财产制度的不断发展,贫富分化的日益加深,最终必然导致阶级(奴隶)的产生。这是历史发展之必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劳动的分工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原始形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的奴隶制(诚然,它还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是最早的所有制"①。恩格斯也说过:"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场所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② 父权制下的奴隶制,又称家长奴隶制或家内奴隶制。奴隶的来源,开始是把俘虏变成奴隶,以后是氏族内部贫穷的氏族成员变成奴隶。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大汶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7 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57 页。

口文化的中、晚期，东夷族内部就出现了人殉的现象。例如泰安大汶口墓地发现的一男一女一小孩三人同时埋葬的合葬墓(M35)[①] 以及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发现的三座杀殉墓(M16、M18、M20)[②] 都是人殉的例证。另外，还有奴隶尸骨的发现。以上史实说明，父权制时期的东夷族内部已出现了最早的阶级奴隶。

2.军事民主制

东夷族的父权制时期由于掠夺财富和奴隶的战争日益频繁与扩大，氏族部落联盟的组织进入了军事民主制的阶段。所谓军事民主制，是指民主和军事的两重性。这就是说，既保留着原始的氏族部落成员的充分的民主权利，又具有军事编制的形式，军事首领拥有很大的指挥权力。军事首领在频繁的战争中不断地加强个人的权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考古资料证明，至少从大汶口文化的晚期就已正式出现了专职军事首领。已出土的龙山文化时期刻有云雷纹的长方形扁平石锛（又称玉钺)和圭形玉斧[③] 都是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是军事首领身分的标志，证明龙山文化时期军事首领的存在。在古文献的记载中,相传太昊、少昊、蚩尤、舜等都是东夷族有名的部落酋长、军事首领，其时代也正是大汶口一龙山文化时期。

3.城堡的出现

现有考古资料证明，东夷族最早的城堡当始于龙山文化时期。现已发现古城堡 4 座 寿光边线王城堡、章丘城子崖城堡、邹平丁公城堡、临淄田旺城堡。龙山文化古城堡的发现,具

①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74 年版。
② 《1987 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文物》1990 年第 2 期。
③刘敦愿:《记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考古》1972 年第 4 期。

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指出：“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① 龙山文化时期，东夷族古城堡的出现，表明东夷人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这样，东夷族原始的氏族部落方国出现了，早期国家出现了。自此以后，东夷族的社会生产关系从父系氏族公社制一步一步地进入了方国林立的东夷古国时期。

第二节采集经济与原始农业

山东原始居民经过旧石器时代数十万年的采集经济实践之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发展了自己的原始农业。东夷族的原始农业大约经历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四个时期。

一、采集经济

从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沂源猿人开始，即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山东境内的远古人类主要靠采集来维持自身的生存。那时，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打制的石器既简单又粗糙。狩猎猎取动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能够维持生存的稳定而又可靠的生产活动就是采集活动。采集的对象也很广泛，凡是可充饥的野生植物的花、果、种、叶、干、茎、皮等，都是那时人们采集的对象。采集劳动所使用的劳动工具，主要是打、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60 页。

采树上果实的木棒和用来采掘、切割植物的皮、根、茎、果实的石片、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这些劳动工具,除易朽腐、难保存的木棒外，其余的石器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山东沂水县南洼洞遗址、日照秦家官庄遗存、以及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山东沂水县骑子鞍山千人洞遗存、新太县乌珠台遗存、日照县竹溪村遗存、郯城县黑龙潭遗存,还有胶东半岛的蓬莱、长岛、海阳等地的遗址都有发现。

关于远古人类采集经济的情形，在古文献中也有反映。如《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民食果瓜。"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礼记·礼运》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淮南子·修务训》亦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这些记载，均反映了远古人类在原始农业产生以前主要靠采集来维持自身生存的情景。东夷人自然也不例外。

远古人类的采集劳动主要是靠妇女来进行的。妇女在长期采集劳动的实践活动中，逐渐认识了某些植物的生长规律，植物的果实、种子在土地、水分和气候都适宜的条件下，就能发芽、生长、开花和结果。于是,人们便在居住地附近将采集来的部分植物种子、果实种在土里。这样，远古居民在长期的采集植物种、果实的实践中便逐渐发展了原始的农业。这个过程，大约经历了数十万年漫长的时间。直到距今约 1 万年以后，全新世早期高温期的到来，为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北辛文化时期的锄耕农业

据考古发掘资料看，北辛文化时期，东夷人的原始农业已

有了相当的发展水平。

北辛文化的典型遗址是滕县北辛遗址。在该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①] 主要有石斧 108 件，其中打制 107 件，磨制 1 件石铲两种，小型石铲 35 件，打制、磨制石铲残片千余件，完整的和较完整的 15 件蚌铲 4 件石镰 6 件蚌镰 5 件鹿角锄 10 件石刀 14 件石磨盘 8 件，都有使用痕迹；石磨棒 7 件；石磨饼 2 件，均有使用痕迹；石磨器 1 件，有使用痕迹。另外，在北辛遗址发掘之前，曾采集到北辛类型石器 10 余件，竟全是农业工具铲 2 件，磨盘 7 件(都有使用痕迹)，磨球 1 件，残磨棒等。铲是农业生产中铲土、翻地的工具，磨盘、球、棒都是粮食加工工具。这些农业工具的发现，反映了滕县地区早在北辛文化时期就是原始农业比较发达的区。在采集的磨盘中，有 1 件(标本 17:020)很值得注意。其形制是："平面略呈椭圆形，两侧较直，背面有矮腿，一端稍向上翘，呈弧形而下，长 65、宽 36 厘米。"[②] 据此磨盘形制（有矮腿，上翘，呈弧形而下）推测，滕县北辛遗址的居民可能是席地而坐，或蹲或坐在石块上使用磨具(磨盘、棒、饼等)对粮食进行加工食用。

此外，邹平苑城北辛文化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也很丰富。该遗址发掘出土和采集的成型石器 88 件，其中农业生产工具 80 件，占石器总数的 90.9%。农业工具的器形有镰形两刃器、斧、铲、磨盘、磨棒、石饼等。其中，铲 40 余件，石磨盘 14 件，石磨棒 21 件，这三种农业生产工具竟占了石器总数的

① 《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 年第 2 期。
② 《山东滕县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0 年第 1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85.2% 以上。[1]

总之，北辛文化的居民已经开始发展原始农业了。农业生产是北辛文化时期东夷居民的最主要的社会生产活动，是东夷居民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

那么当时农业生产的主要作物是什么？据北辛遗址发掘的资料可知，在出土的陶器中有 8 件陶器(钵 4、碗 2、小口壶 1 勺 1 件）的底部印有粟糠痕迹。可见，粟类作物是当时的主要作物。

据现已发掘的北辛文化遗址资料，遗址文化堆积层都比较厚。例如,北辛遗址文化堆积层厚达 1.5 米以上。据碳十四的测定年代，为距今 7300 年至 6300 年左右，大约经历了 1000年左右。可见当时的居民已经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原始农业生产是当时居民定居的保障，而居民定居生活的稳定又是原始农业生产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农业

大汶口文化时期，原始农业在北辛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气候较前温暖。从各地发掘的大汶口文化墓葬看，当时普遍使用獐牙随葬。如泰安大汶口墓地，共发掘墓葬 133 座，其中随葬獐牙的有 88 座，占墓葬总数的 66.1%,共葬獐牙 191 个，平均一墓 2.17 个。如以 133 座墓计,平均一墓 1.42 个。可见当时的獐类一定不少。而獐这种动物，性喜温暖。在今天，獐生活在南方太湖一带温暖而又湿

1 《山东邹平苑城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9 年第 6 期。

润的沼泽区域，黄河流域已绝迹。而大汶口文化时期，黄河下游地区居然有如此多的獐类存在，说明当时的气候不像现在这样冬季干旱寒冷，而是温暖湿润的气候。我国著名气象地质学家竺可桢在研究了中国近 5000 年来气候的变迁之后,也曾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墟殷，大部分时间的平均温度高于现在 2℃左右。一月份温度大约比现在高 3℃—5℃。"① 如此温暖湿润的气候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这时，农业生产工具有了很大的改进。石制农具全部磨制，而且很精致。种类和数量也都增加了。现以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为例说明如下②：

石铲 27 件(其中玉铲 2 件)。形状有舌状、扁平梯形、扁平长方形等。上部穿孔,大多穿 1 孔、2 孔,个别有穿 4 孔的。穿孔可捆绑木柄，便于用力。这比北辛文化时期无穿孔的石铲进步得多。长度一般在 15 厘米以上。刃部锋利，有的有使用痕迹，还有的有使用时遗下的缺口。

石斧 10 件。体形一般较厚而窄长。穿孔多近腰部。刃多弧刃、斜弧刃，多有使用崩碴。石斧穿孔也是一大进步。

石锛 63 件。是加工工具。大多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此外,还有采集的石斧 2 件、鹤嘴锄 1 件。

以上这些工具都是用来砍伐树木、清除树根杂草、开垦土地、进行耕种的。

镰 25 件。这是割草、收割工具。大汶口文化时期,镰的质

①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②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74 年版。

料增多了,有牙、蚌、骨三种。有的镰穿 1 孔或 2 孔。

牙刀 53 件。利用猪獠牙削磨而成。可用来收割、切削、刮磨、钻镂,是多种用途的工具。

其他还有 石磨棒 2 件,研磨工具 石锤 3 件,研磨敲砸工具 石磨盘 1 件(采集品)。

除大汶口遗址外，其他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基本上同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农具一致。

总之，从以上农业生产工具来看，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较北辛文化时期有显著的进步。

此外，考古发掘的其他资料也证明了这个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例如：在长岛北庄遗址发掘的墙皮中发现掺有许多黍子的皮壳① 山东地区黍子的种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个贮藏粮食(粟)的库房。内中还遗留有 1 立方米多粟。粟,俗称谷子。山东地区盛产谷子，其种植历史是很久远的。还有，在该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层还发现了 30 多个贮藏物品的大窖穴。② 以上资料说明,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族的原始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四、龙山文化时期的农业

龙山文化时期，东夷族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铜制工具的出现

考古发掘资料证明，龙山文化时期确实出现了冶铜术和

① 《山东长岛北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 年第 5 期。
② 《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15 页。

铜质生产工具。如胶县三里河出土的两件黄铜钻形器，表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2. 石制农业工具较大汶口文化又有较大的进步

这主要表现在形制多样、磨制精致，特别是大型半月形、双穿孔的石刀、石镰的大量使用。这就为龙山文化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新的农业生产工具石镢。除石器外，当有不少木质农具。只因木质农具易腐烂，不易保存，在考古发掘中很少发现。不过，偶而也能发现一点遗迹。在山东，最早发现木质农具的遗址，是在茌平尚庄遗址的龙山文化灰坑中发现使用双齿木耒的痕迹。①

3. 大量灰坑、窖穴和贮藏器的发现

在已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差不多都有比较规整的灰坑和窖穴，而且有的遗址还发现很多。例如：茌平尚庄遗址总面积 7.5 万平方米左右，在已发掘的 1125 平方米范围之内，竟发现 139 个灰坑，1 条灰沟。灰坑分布很密集。②潍坊姚官庄遗址龙山文化层，在发掘的 1725 平方米范围内，发现灰坑 130 多个。③ 胶县三里河遗址龙山文化层，共发现贮藏物品的窖穴 37 个，其中大型的有 8 个。出土的大型带盖的贮盛陶器，有瓮、缸、罍等④，除贮水外，更主要的当是用来贮藏粮食的。以上大量灰坑、窖穴和贮藏器的发现，都间接地说明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

① 《茌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 年第 4 期。
② 同①
③ 《山东潍坊姚官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3 年第 7 期。
④ 《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21 页。

4.粟和水稻的发现

在胶东栖霞杨家圈遗址龙山文化层和灰坑中，发现粟和水稻的皮壳和印痕，说明当时种植的农作物，除旱田作物外，还有水田作物，反映了龙山文化时期整个山东直到胶东半岛，气候温暖湿润，给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五、岳石文化时期的农业

岳石文化时期，东夷族的农业生产工具虽然仍以石器为主，但铜制生产工具已有较多的发现。龙山文化时期已出现了黄铜器(黄铜钻形器),而岳石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铜锥,经化验鉴定为青铜。[①] 这虽然只是一件青铜锥，但它证明岳石文化时期，东夷人已经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

这个时期石制农业生产工具以石刀和石铲的数量最多。以牟平照格庄岳石文化遗址为例，出土石器共 77 件,其中石刀 22 件,石铲 12 件，二者约占石器总数的一半。出土的石刀，均穿双孔。石铲，有的刃部有条形使用痕。此外，还出土骨铲 4 件，用牛肩胛骨制成，两面磨平，刃由一面磨成。有的骨铲，刃部有条状磨擦使用痕迹。总之，石器中,一面凸一面凹的半月形双孔石刀、扁平石铲,以及骨器中的凹刃骨铲(耜)等,都具有鲜明的特征[②]。岳石文化时期，继续使用木质的农业生产工具——双齿耒。1985 年在泗水尹家城遗址进行第四次发掘时，在岳石文化灰坑（H527）的坑壁上发现“留有清晰的生产工具双齿耒的痕迹,双齿平行,间距为 6.5～7 厘米,齿的宽度为 2～3 厘米，从发现情况观察，双齿均为略带弧度的扁体

① 《山东牟平照格庄遗址》,《考古学报》1986 年第 4 期。
② 同①。

形”①。其他木质农具，至今尚未发现。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反映了岳石文化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

下面，再从岳石文化的灰坑和窖穴的发现看农业生产的发展。目前已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址，在数量上远没有大汶口——龙山文化的遗址那样多，那样丰富。但是，这些已发现的遗址，大多都有较多的灰坑和窖穴，而且灰坑和窖穴都比较大。如牟平照格庄遗址，总面积不到 4 万平方米，在发掘的 280 平方米范围内,就发现灰坑 43 个、灰沟 3 条。灰坑绝大多数口部呈椭圆形。此外还有带斜坡或台阶通道的二联坑和三联坑。这种二联灰坑和三联灰坑只发现于岳石文化时期，在此以前，尚未发现过。以上这些窖穴和灰坑，都是贮藏物品和倒垃圾之用。窖穴和灰坑的增多与加大，是当时社会物质财富增多的反映，也是东夷人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反映。

第三节　狩猎经济与原始畜牧业和渔业

一、狩猎经济

从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沂源猿人时代起，山东境内的远古人类，为了生存，便不得不依靠原始群集体的力量和简单的打制石器、木棒等进行狩猎活动,猎取野兽,食其血肉,披其皮毛,维持自己的生存。正如《礼记·礼运》所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在已发现的旧石

①《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第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87 年第 4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